小人物写进“两高报告”让人感动

王安忆代表：生活在倒推着要求我们的法律更加完善

“我为什么会这么关心‘两高报告’？因为在这么一个全局性的报告中，我注意到一些情况，它意味着我们这些年社会生活的变化，非常快速。而我们的立法就好像是在与生活赛跑，生活在倒推着要求我们的法律更加完善。”在10日上午举行的上海代表团全团审议中，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协副主席、市作协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安忆说，于欢案、徐玉玉案等这些小人物的案件被写进了今年全国两会的“两高报告”中，带有对社会制度完善的要求。

青年报特派记者 刘晶晶 北京摄影报道

小人物被写进“两高报告”，在王安忆代表看来，也显示了“司法就是为了我们所有人”。

常常旁听审讯 所以会关注“两高报告”

“可能是我的职业特性，写小说的人会很关心案件、犯罪，在其中也会更关注个体。”王安忆代表说，在作家们看来，很多案件都是写作的好素材。“像聂树斌案也已经有小说了，因为都是最最极端的情况。”

她也经常会去采访、看案卷，旁听审讯。她还记得这样一个悲剧。被告人是一名石家庄的男子，到上海打工，妻子与他分手后又有了新男友，有一晚他去了妻子和新男友的住所，发生了冲突，最后杀死了那个男人。

“我们写小说的更注意细节。”王安忆代表说，庭审场面让她觉得非常沉重。“公诉人非常善于表达，而派给男子的法律援助显然也不抱希望，那名男子也没有亲戚来听，只有一个工友来旁听。”

最后案子纠结在是激情杀人还是蓄意谋杀。因为男子身边带了一些作案工具，包括一把手工刀、手套、胶带纸。“这名男子后来有一句话我听了以后非常不安，他说，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事，这些细节都不能够算什么。因为后来发生的事，这些细节才被纳入到了证据链中去。他的话也是有道理的。”而这名男子之后还是被判了死刑。

这个案子让王安忆代表印象深刻。这也是她为什么会这么关心“两高报告”的原因。

社会生活倒过来要求 我们的司法更加完善

从今年的“两高报告”中她的确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意味”。

“‘两高报告’和我们这个职业关心的不一样，是全局性的，带有归纳性质，当然不是那么生动、那么具体。在这么一个全局性的概括的报告中，我注意到一些情况，它意味着我们这些年社会生活的变化，非常快速，我们的立法好像是在与生活比赛，在赛跑，发生了什么事情立法赶紧跟上，而且跟得非常紧密。”

王安忆代表发现，报告中有好几个案件都是社会生活“倒过来要求我们的司法完善”。比如其中提到的要保证婚姻家庭的稳定。

“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在我们之前的生活里边都是有公序良俗的，这些公序良俗可能是靠一些潜在的社会结构来维持，比如说乡村的宗族制度，在单位里职工和领导、同事的关系，现在随着人口流动增强，这些潜在因素显然已经消失了，只能通过司法介入来维持秩序。”

像这个提法，在她看来和这些年来的私有财产积累有关。“有了私人财产，遗产的问题来了，分配的问题来了，夫妻离婚以后才会考虑到怎么划分。这都是国民生活中的新情况，我觉得我们的司法还是跟得非常紧密的。”

又比如农民工欠薪的案例，背后反映是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农民工的身份。“他们就是工人，就是职员，可为什么要给他们戴一顶农民工的帽子呢？让他们的收入变得不安全？这还是跟制度有关系。”王安忆代表说，而此时的司法介入非常好，是“倒过来要求我们尽快改变他们的身份”。

小人物的案子 反映的是时代的新问题

王安忆代表还注意到，在“两高报告”里都提到了徐玉玉这个案子。这是个小人物，是个年轻的女孩子，但她的案子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问题——“大数据时代到来了，我们的数据生活是完全透明的，这样透明的情况下我们怎么保护私人信息的安全。”她说，这个案子的判法就带有一种意味，意味着将来司法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会起到什么作用。“这也是‘两高报告’中不断提到这个案子的原因。我觉得是在倒推着要求我们完善我们的制度。”

于欢案在她看来也是如此。“我们写小说的人会很注意这些个体里边释放出来的社会场景。”她说，于欢案表面看起来是一个私人争斗，背后反映出来的是中小型企业的贷款问题，地方恶势力问题。“贷款太难所以借高利贷。为什么社会会把一个年轻人逼到这样一个绝境，最后只好去杀人？我觉得这些案子被写入我们的‘两高报告’里，可以看得出来是带有对社会制度完善的要求。”

王安忆代表表示，“两高报告”所关心的、所举的例子都带有突破性，可见也是意识到了社会生活在变化，针对一些新问题要尽快完善制度。

在司法过程中 不要嫌媒体麻烦

而当小人物被写进“两高报告”，在王安忆代表看来，也显示了“司法就是为了我们所有人”。

她说，能看出来司法现在非常倾向于民情和民意。令她注意和关心的还有几起错案的纠正。“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都看过美国电影，要推翻陈年旧案，需要很多很多力量，需要很多颠覆性的行为才能做到。而我们做到了。”

“媒体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司法的过程中不要嫌媒体麻烦。媒体有时候可能会添一些麻烦，但也会帮助司法走向更完善。”王安忆代表说，“我在想，上海是不是也应该按照‘两高’的报告来检查一下，我们是不是也有些陈年积案能够做出纠正。”她最后说。

■两会直通车

刘晓云代表：

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本月推开

本报北京专电 记者 刘晶晶 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刘晓云代表介绍，难啃的“执行难”硬骨头目前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上海是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两年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城市之一，最近上海社科院也进行了评估，结果将于近期公布。在信息化建设方面，也取得跨越式发展。上海法院去年率先开发的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人工智能辅助办案，今年3月份起将在全上海市推开，4、5月份会在中、西部选择一些试点，年底全面推开。

刘晓云代表介绍说，在司法体制改革基本完成后，上海是目前唯一一个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试点地区，根据要求要在两年内全部完成，其中大部分要在今年年底完成，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目前已形成了方案，将改革任务细化为8大类72条136项具体任务，并制定了任务分解表，全力推进。有44项已取得初步成效，58个项目已确定规范性文件或是方案，正在推进。”他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可以进一步加强指导，推动完善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顶层设计，指导上海法院统筹好各项配套改革任务，帮助破解改革中遇到的难题，推动改革顺利进行。

此外，他还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可以进一步加强对案多人少矛盾的研判应对。据他透露，2017年上海法院法官人均办案居全国第一。因此他也建议最高人民法院能加强研判，从长远出发，与中央编制部门联手建立科学的审判人员编制动态增减机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案件增长情况适时地增加人员编制，或在各省市法院之间调整配置数，保证审判人员设置与日益繁重的审判任务相一致，为人民法院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保障。

公 示

根据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关于第22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工作要求，经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酝酿审议并报团市委党组同意，拟推荐“中国商飞C919大型客机首飞机组青年团队”，作为第22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参评集体。现根据评选工作有关程序，对候选对象予以公示。如有异议，请在2018年3月16日（周五）17:00前用真实姓名以电话、传真或者信函等形式将意见反馈至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信函以到达日邮戳为准）。

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丛昀

联系地址：东湖路17号603室（200031）

联系电话：021-61690207、60827357（传真）